

G723.7.296
4



马列著作

在中国出版简史

王 东 陈有进 贾向云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马列著作 在中国出版简史

陈有进 贾向云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王东、陈有进、贾向云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211-06045-0

I. 马... II. ①王…②陈…③贾… III. 马列著作—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 IV. A5 G23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8766 号

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

MALIE ZHUZUO ZAI ZHONGGUO GHUBAN JIANSI

作 者: 王 东 陈有进 贾向云

责任编辑: 陈艺静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金山工业区浦上标准厂房 B 区 42 幢 邮政编码: 350008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27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211-06045-0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言

- 马列著作出版史上的东方奇葩 (1)
- (一) 出版简史新对象 (2)
- (二) 图文并茂新形式 (3)
- (三) 版本演化新梳理 (4)
- (四) 三个阶段新概括 (5)
- (五) 三大疑难新破解 (7)
- (六) 一座丰碑新矗立 (10)
- (七) 历史经验新开掘 (12)

上 编

中国革命三十年：出版起点，理论奠基

——马列著作出版事业的创立阶段 (1919~1949 年)

第一章 五四时期，伟大起点

- 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出版的历史开端
(1919~1920 年) (15)
- 第一节 日出东方的历史背景 (15)
- 第二节 李大钊首创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8)
- 第三节 1919 年在《新青年》“马克思号”，李大钊发表《我的
马克思主义观（上）》 (22)
- 第四节 马列著作锋芒初试
——李大钊 1918 年底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24)

第五节	北大最早开始系统搜集、整理、翻译、介绍马克思学说	(27)
第六节	1920年在陈独秀支持下的陈望道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30)
第七节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著作单行本在中国出版的历史起点	(33)
第二章	思想建党，强大支柱	
	——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工作的生动开局	
	(1921~1936年)	(35)
第一节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思想建党，理论奠基	
	——建党初期，陈独秀、李大钊开创马克思主义著作	
	出版事业的功绩	(35)
第二节	建党之初创立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马列著作	
	——李达的最初奠基之功	(38)
第三节	呕心沥血，薪火相传	
	——《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出版的十人思想接力	(43)
第四节	马克思新唯物论的主要著作中译本问世	(49)
第五节	名家荟萃，东方奇葩	
	——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冯雪峰五位文化	
	名人的译作	(53)
第六节	恩格斯主要著作的中译本	(57)
第七节	列宁著作的中译本大量问世	(58)
第三章	延安时期，光辉灯塔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马列著作出版的盛况	
	(1937~1949年)	(60)
第一节	五四薪火传延安，群星灿烂宝塔山	
	——驳斥所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褊狭论、落后论、农民	
	社会主义论	(60)
第二节	毛泽东的“四个亲自带头”	(61)

第三节	1938 年延安创立马列学院, 总书记张闻天挂帅	(67)
第四节	“马克思恩格斯丛书” 10 卷本和《列宁选集》 20 卷本 ——延安时期系统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最初 尝试	(70)
第五节	《资本论》四卷本在中国第一次完整出版 ——郭大力、王亚南的历史功绩	(75)
第六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中国论著的出版 ——中国革命的思想火炬	(79)
第七节	中央军委成立编译处, 恩格斯等军事论著系统出版 ——毛泽东军事哲学是一种创新	(81)
第八节	延安整风 ——毛泽东提出马列著作出版的宏大构想	(84)
第九节	延安—上海: 苏区与白区的主辅两个出版中心 ——李富春及邹韬奋、钱俊瑞、李公朴三个红色出 版家	(87)

中 编

新中国成立之初三十年: 系统出版, 崭新局面

——马列著作出版事业的曲折发展阶段 (1949~1978 年)

第四章 最初八年, 壮丽日出

——马列著作在中国系统出版的崭新局面 (1949~1957 年)
..... (95)

第一节 “干部必读” 12 本, 一年发行 300 万
——马列著作出版史上的“中国奇迹” (96)

第二节 成立人民出版社
——马列著作的国家出版机构 (99)

第三节 成立中央编译局
——马列著作的国家编译中心 (100)

第四节 借鉴俄文版, 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第1版	(104)
第五节 借鉴俄文版,开始出版中文版《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	(106)
第六节 出版马列著作文集、文选等多卷本	(108)
第七节 系统出版马列著作单行本	(109)
第八节 创立民族出版社,出版少数民族文字版马列著作	(112)
第五章 中间十年,曲折发展	
——马列著作出版事业的发展与曲折(1957~1966年)	(114)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出版21卷	(115)
第二节 《列宁全集》全部出齐	(117)
第三节 我国首次自行选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	(119)
第四节 系统出版马列著作单行本	(121)
第五节 出版干部选读“三十本书”	(123)
第六节 首次出版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马列著作大字本和线装本	(124)
第七节 出版了多种书信集	(127)
第八节 马列语录被滥用的历史教训	(129)
第六章 十年动乱,遭受磨难	
——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一度中断	(132)
第一节 马列著作出版事业遭受破坏	(133)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断出版达6年之久	(133)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已经印成书,但不准发行	(134)
第四节 1969年:马列著作单行本出版中断一年	(135)
第五节 1971年:周恩来力挽狂澜反极“左”	
——马列著作出版事业枯木逢春	(137)
第六节 1975年:邓小平复出进行全面整顿	
——马列著作出版呈现更大转机	(139)
第七节 1977~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	

——呼唤马列著作出版事业复兴的春风	(140)
-------------------------	-------

下 编

改革开放三十年：全面出版，创新基石

——马列著作出版事业的创新阶段（1978 年至今）

第七章 正本清源，重新奠基

——马列著作出版的重新启动（1978～1992 年）	(149)
----------------------------------	-------

第一节 正确对待马列著作的出版事业

——邓小平理论起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79 年 理论务虚会	(149)
---	-------

第二节 马克思逝世百年的三大学术盛事

——马克思著作在中国出版成果的历史巡礼	(152)
---------------------------	-------

第三节 成仿吾晚年第五次重译《共产党宣言》

——“东方奇葩”的一面镜子	(156)
---------------------	-------

第四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补卷”部分 11 卷

的全部翻译出版	(159)
---------------	-------

第五节 《资本论》第一手稿《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的真正面世	(163)
-------------	-------

第六节 《资本论》文本群与文本体系首次在中国完整面世

.....	(165)
-------	-------

第七节 《列宁文稿》的出版 (167) |

第八节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翻译出版

——林基洲、岑鼎山等翻译家的历史功绩	(168)
--------------------------	-------

第八章 关键时期，中流砥柱

——20 世纪 90 年代：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马列著作 出版事业（1992～2000 年）	(171)
---	-------

第一节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

——马列著作出版事业继续发展不中断的强有力保障	(172)
----------------------------------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
——马列著作出版研究的理论创新奠基 (173)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列宁选集》第三版的编辑出版 (175)
- 第四节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的及时出版 (177)
- 第五节 MEGA 的国际新动向、新走势 (180)
- 第六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新探索、新进展 (182)
- 第七节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更靠近历史考证版的新版本 (186)

第九章 科学发展，活水源头

——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的新纪元（2000～2009 年） ... (190)

- 第一节 加强马列著作出版的新举措 (190)
- 第二节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对马列著作出版史影响深远的战略举措 (191)
- 第三节 马列著作编译的网络化、信息化
——多媒体等现代化手段引进马列著作出版事业 ... (193)
- 第四节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列宁学
——马列著作出版史、版本学成为研究对象 (194)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专题单行本的系统翻译出版 ... (195)
- 第六节 《资本论》文本群的重新系统出版
——当代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模式创新的重要理论奠基 (196)
- 第七节 马克思晚年笔记、列宁《哲学笔记》的出版 (203)
- 第八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书信出版的新阶段
——窥视历史巨人心灵奥秘的一面镜子 (208)
- 第九节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三代中国学人的自主创新探索 (219)
- 第十节 《共产党宣言》的 32 种中译本
——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传播的一面镜子 (228)

导 言

——马列著作出版史上的东方奇葩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开花、结果？

为什么在苏东剧变与当代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巍然屹立，创造“中国奇迹”？

长时期以来，“中国奇迹”之谜一直吸引着当代国人乃至全世界的普遍关注。

在总结历史经验，深入思索“中国道路”、“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的时候，上述“中国奇迹”之谜总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提出来。

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为解开这个历史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时俱进，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创新——这是“中国道路”、“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的深层奥秘。

在这里，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前提，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为创新型政党、创新型国家的创立，起了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

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型理论，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创新型政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创新型国家，使中国现代化模式成为创新型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创新型体制。

为了更好地解开这个“中国经验”、“中国奇迹”之谜，本书对马列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做了一番追根溯源的探索，在以下七个方面力图有所创新：

（一）出版简史新对象

本书以马列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为研究对象，写出一部马列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简明历史，在研究对象上有一定新意，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空白。

根据我们查阅的国内外学术资料，前人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马列著作在中国传播史、马列著作在俄国出版史、马列著作中译本书目。

我们在借鉴和汲取前人上述三种成果的基础上，在研究对象上，力图有所创新，有所拓展。

我们努力吸收马列著作在中国传播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力图从中区分出马列著作翻译、出版史，作为相对独立的崭新研究领域。在这方面，前人已经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如中央编译局 1954 年曾举办了一个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展览。

1983 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时，中央编译局马恩室出版了集体编纂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前半部分荟萃了柯柏年、吴黎平、张仲实等几位著名翻译家的感言或回忆录，后半部分则简单概述了 1983 年以前马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以及翻译、编辑、研究、宣传过程，这对我们有很大帮助；中国人民大学庄福龄教授发表了学术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1988 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侧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史上，对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的历史，则尚未作出专门研究。

如果说到马列著作出版史研究，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找到这方面的 4 部著作，多半讲的是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俄国或苏联出版的历史：一是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2006 年版）；二是俄国学者列·阿·列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发表和出版》（1948 年版）；三是苏共中央直属马列主义研究院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遗著——在苏联的发表和研究史》（1969 年版）；四是苏共中央直属马列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室编写的《伟大的遗产》。这些著作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但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的历史，却有待我们进

行专门研究。

马列著作在中国的中译本书目，至少也有两三部较有影响：

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曹鹤龙、苏爱荣、张育平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1983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收录篇目截止到1980年。

中央编译局马恩室胡永钦、耿睿勤、袁延恒等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末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文）第一版书目”，截止到1983年。

（二）图文并茂新形式

马列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历史——通常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繁琐而又缺乏可读性的题材，不要说一般读者会见到题目就望而却步，就是专家学者也往往难于对其有兴趣，也许只有极少数专门研究这类问题的研究人员才会仔细阅读。

以往的专业书籍，有的已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然而，真正的读者，却几乎寥若晨星。

我们这次试图在表述形式上也有所创新，努力创造一种图文并茂的新形式，更具体地说就是在资料翔实的基础上，讲历史，说故事，观图片。

一是讲历史。本书不是资料的简单堆积，翻译书目的静态展示，不是“甲乙丙丁”式的中药铺，也不是繁琐乏味的“流水账”，而是把马列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史看作是生动的历史，一条流动的历史长河。

二是说故事。本书在讲历史的时候，尤其是在讲马列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历史的时候，不仅试图做出理论概括、逻辑推演，更主要的是表达方式是讲故事。讲述五四运动90年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以来，那些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把天上圣火带给人世间的革命家、先驱者和翻译家、出版家的故事。

三是观图片。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在讲历史、说故事的同时，讲

到马列著作出版的历史和故事时，不单有语言叙述，同时展示图片。我们请摄影方面有专长、多次举办过个人摄影展的北京大学博士生王放，在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人民出版社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支持下，拍摄了相关图片 1000 多张，从中精选出 200 来张，以飨读者。

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地叙述马列著作在中国的出版简史，这是本书的一个有益的尝试。

（三）版本演化新梳理

本书不仅竭尽全力地搜集整理了马列著作的中译本书目，而且努力在翔实资料的基础上，对马列著作中译本的版本演化，作出梳理与理论概括，试图一目了然地把握版本演化的历史轨迹与发展趋势，这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础性、前提性的工作。

读马列著作，有两个不同的阶段：一是比较初级的学习阶段，二是比较高级的研究阶段。如果仅限于一般阅读，初步学习，那就不必过多地花费时间，多此一举地弄清版本演化问题。相反，如果想有所提高，进入研究境界，那么弄清版本演化则是必经之路，必不可少。

在 2006 年出版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一书中，北大教授王东曾对马克思文本的出版历史与版本演化，从世界历史高度作出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理论梳理。本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马列著作中译本的版本演化过程。这对于我们理解马列著作的深刻内涵，势必产生不小影响。

从马克思原始文本，到我们今天说到的中译本的出版，往往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语言转换、编辑加工过程，不了解这个过程，就无法更好地把握马列著作的深刻内涵。

本书梳理了从马克思原始文本到中文第一版的版本演化轨迹，其间一个最主要“中介”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也就是先经过俄文翻译、加工、编辑，然后再翻译中文的，得失互见，瑕瑜互见，这是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

本书还试图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中文第一版到中文第二版

的演化轨迹，其中最重要的“中介”，是我们不仅借鉴了俄文第二版、中文第一版的翻译、出版成果，而且更多地注意到国际此相关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资料成果和出版成果。

本书也探讨了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一版到第三版、第三版，《列宁全集》、《列宁选集》从中文第一版到第三版的发展过程演化轨迹。

本书特别注意最基本的马列著作的版本演化。

(四) 三个阶段新概括

在扎扎实实的不同版本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试图对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的历史，做出理论概括。

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从1919年到2009年，正好是90年，恰好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之前30年，这是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的奠基阶段。主要特点是结合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需要，先后出版了马列著作，出版形式是以单篇为主，适当组合。

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成立之后前30年，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奠基时期。不仅有民族独立的奠基，工业化的初步奠基，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奠基，而且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事业的初步奠基。成立人民出版社，创立中央编译局，出版“干部必读”12本，基本出齐两大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正是这一点成为中国虽历经十年动乱而根基未垮，进而改革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

第三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改革开放30年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创新期，也是中国现代化经济起飞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事业没有像某些国家那样发生中断或崩溃，而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特点是开始突破传统计划经济苏联模式的影响，文本上突破俄文版的历史局限，更多地注意吸收国际文献学、版本学最新成果，出版或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中文第二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等马列著作新译本。

为了更好地把握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的历史主线,本书进一步把“三个30年”的三大阶段,与中国革命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一般历史发展轨迹,大体同步,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史,又有自身特点、独特逻辑和鲜明特征。

五四以后到新中国成立——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创立阶段,这个阶段有三个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最有特色:

第一,是五四时期。这是马列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伟大历史开端。其起点的标志:一是李大钊从1918年底开始在北京大学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9年《新青年》“马克思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翻译引证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论著;二是1920年在上海陈独秀的支持下,陈望道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

第二,是建党初期。经李达等人努力,马列著作出版工作生动开局,走出“思想建党领先一步,马列著作出版奠基”的创新道路。

第三,是延安时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经过毛泽东、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倡导,经过柯柏年、吴黎平、成仿吾、何思敬等一批翻译家的共同努力,出现了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空前盛况,在马列著作的世界出版史上亦堪称“中国奇迹”。

新中国成立之初30年左右——马列著作在中国系统出版的奠基时期,这个时代也包括各具特色的三个阶段,恰好大致与“三个十年”基本吻合:

第一个十年,更确切地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头8年(1949—1957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如壮丽日出的时期,也是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事业的壮丽日出时期,从个别著作出版到系统出版,是其显著特点。

第二个十年,曲折发展的中间十年(1957—1966年),这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总体特征,也是马列著作出版在这一时期的历史特色,有发展也有曲折的二重性是其特点。

第三个十年,严重磨难的十年(1966—1976年),马列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事业,一度出现中断,走向凋零,但是没有完全泯灭,1971年周恩来总理反对极“左”,1975年邓小平倡导整顿,都使马列著作出版

事业在艰难中寻求重生。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历史写下了新的篇章，马列著作出版事业在中国也开创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新阶段迄今为止，也包括三个时期，恰巧大约“三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相当于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起步期，也是马列著作出版事业的重新起步期，最重要的历史标志，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 11 卷、《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 60 卷的出版。

第二个十年相当于 20 世纪 90 年代，是改革开放体制转轨关键时期，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事业没有中断，反而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开始出版是其显著标志。

第三个十年，21 世纪头十个年头，既是改革开放新阶段、新起点，也是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的新阶段、新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等著作系统出版是其历史性标志。

（五）三大疑难新破解

——驳“理论准备薄弱论”、“农民社会主义论”、“列宁暴力社会主义论”

怎样对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传播的情况做出总体评价？这是值得高度重视和反复思索的大问题。在这方面，长期以来国内外有三种流行观点，值得我们今天根据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的事实，作出新的回答：

（1）刘少奇在 1941 年提出的“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薄弱论；

（2）科拉克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三卷本中提出的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是农民社会主义的观点；

（3）近年来谢韬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创立早期，传播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而是“列宁暴力社会主义论”。

这三种观点提出的出处是各不相同的，绝不当把刘少奇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卓越领袖所作

出的积极理论探讨，同后两者的错误观点混为一谈。然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这些观点都忽视了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的一个基本事实：五四运动以来 9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的准备时期起，马列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就受到高度重视，并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年，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年，马列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事业更进一步得到重视与发展。

只有了解这个基本事实，有助于我们对上述问题，作出全新回答。

因此本书试图对上述三个问题，作出新的回答：

1. 关于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薄弱论的新回答。

1941 年，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宋亮即后来改革开放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信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准备薄弱的问题，这一理论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

这封信，首先做出了上述基本判断：“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①

接着，这封信还分析了中国党理论准备薄弱的三个原因，多半都牵涉对马列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史的评价问题：

“中国党的理论准备不够，上述错误的意见与之有关而成为其原因之一，但这也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些原因就是：

“（一）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在五四运动时才有很少的输入），不像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布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又由于中国当时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273 页、274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